

中国农村现代化 社会基础研究

ZHONGGUO NONGCUN XIANDAIHUA SHEHUI JICHU YANJIU

王立胜◎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农村现代化 社会基础研究

ZHONGGUO NONGCUN XIANDAIHUA SHEHUI JICHU YANJIU



人民教育出版社

策划编辑:胡元梓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肖 辉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王立胜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
ISBN 978-7-01-007795-6

I. 中… II. 王… III. 农业现代化-研究-中国 IV. F32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6453 号

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

ZHONGGUO NONGCUN XIANDAIHUA SHEHUI JICHU YANJIU

王立胜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

字数:265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7795-6 定价:4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2005年,立胜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在我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其实,早在十年前我已经熟悉王立胜这个名字。那时他还是个三十岁刚出头的年轻人,就出版了在中共党史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专著《晚年毛泽东的艰苦探索》,后来听说这部著作获得了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这应该说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在赞赏立胜的勤奋、才华和天资的同时,却未曾想过日后和他会有师生关系。2004年6月,在我的博士研究生李安增的介绍下与立胜相识,深谈之下发现他在从事了多年行政领导工作之后,非但没有失去学者的睿智,同时又具备了从实践工作中磨炼出的务实与练达,对转型期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而且他的知识容量和思维能力也是许多学生所不具备的。立胜为人谦虚厚道,对待学界前辈执师礼非常恭敬,我为能和他相识而感到高兴。一年后,立胜提出要报考我的博士研究生的想法,并顺利通过入学考试,开始了我们师生交往的经历。今天,他的博士论文出版了,立胜请我为这本书作序,作为导师,还有比看到自己学生的优秀专著出版更欣慰的事情吗?我非常高兴在他的著作前面写下一些自己的话。

立胜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一个以“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概念为核心的理论框架,用以分析和解释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现代化演进的方向、动力和机制问题,更试图以这个概念为基础分析当前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实现方式和途径,找到破解“三农”问题的一个突破口。这是一个很大的理论和实践难题,又是一个宏大的学术愿望。应该说,这个愿望在立胜的博士论文中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实现。中国“三农”问题的实质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在特定资源条件下,分散的小农与市场对接的成本太高,表现为小农与资本之间的关系紧张;二是分散的小农与政府之间的交易成本太高,表现为农民与国家的关系紧张。这两种紧张关系是当前“三农”问题成为严重战略问题的历史根源所

在。极度分散的小农形态与近代以来中国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道路之间有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紧张,这种紧张状态促成了近代以来中国基本的社会结构形态的形成,并伴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整个过程。化解这两种紧张状态的努力在国家战略的层面上体现为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国家政策导向。由此,立胜将农民间的连接关系、农民个体与国家的连接关系以及由农民个体经由特定的形式组成的农民群体与国家的连接关系模式,作为决定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方向、模式和形态的根本性因素,并以“社会基础”这一概念来概括这一组关系模式,与此同时,他又把调整 and 改变这种关系模式的努力称之为“社会基础再造”。

这是论文的核心概念,更是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和分析工具,难得的是,立胜能够将其操作化为一系列具有中层理论特点的分析工具,并建立了自己独到的分析框架。在立胜的博士论文中,以“社会基础”概念为核心,从市场化战略对中国农村既有社会基础的双重消解、重建中国农村基层基本连接模式、发展农村合作组织、重构农村金融、重构乡村秩序、重建农民观念世界,以及农村税费改革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等方面,对影响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包括以村民自治为特点的农村基本政治制度、以农村合作组织为主要形式的农民一致行动能力的形成、良性农村金融环境的生成、多元化乡村秩序机制的建立、作为价值基础的农民观念世界的建构、农村税费改革对乡村政治生态的深刻影响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质的规定性和着力点等关键问题进行了详尽分析。他指出,任何一种国家战略和社会理想目标的实现,必须有相应的社会基础相对接,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现代化的实践中,迄今为止的社会基础并不能与实际上的发展目标相契合,由此就必须进行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要在发展模式和路径上努力实现与社会基础的契合;另一方面,又要再造社会基础以实现与总体目标之间的对接关系。通过这种分析,回答了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如何使农民形成一致行动的能力,在保证自身福利的前提下,实现与国家战略之间的对接,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这样的一种分析范式当然不可能由某一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完成。在确定博士论文选题之前,立胜曾多次向我讲述了他在多年阅读、研究和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思考和困惑。他说,这种困惑主要不是来自理论上和逻辑上,或者说

不是来自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推演,而是来自实践中形成的真正的问题。立胜的想法是要从问题出发,而不局限于某一个学科视角来完成他的博士论文。我支持他的这种想法。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回应时代要求,回答并最终解决特定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以达到增进社会福利的目的。虽然,这种问题意识并不排斥学科意识,因为任何研究对象总要有相对应的学科理论和方法,否则就不可能实现研究的分工、不可能在分工的基础上实现一般的精细化的协作。但问题在于实践,或者说实践中的问题是不会按照研究者出于职业或专业划分而形成的研究模式来“规规矩矩”地出现的,也就是说,实践中的问题并不会按照学科划分来自我塑造一个明晰的对象以供研究,作为研究者只能调动所有的学术研究资源、使用能够使用的一切学术技术手段去分析、研究、解释和解决该问题。以中国农村现代化问题为例,从问题意识出发和从学科意识出发所看到的中国农村是截然不同的,它是如此复杂,任何一种单一的视角都有可能将完整的实践割裂开来,所呈现出来的都有可能是由某种学科思维定式所描述的实践的影像,而不是实践本身。这里面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一种学科视角可以发现一些问题,但是同时会“自觉”地屏蔽掉另一些问题,被屏蔽掉的这些问题并非不重要,它之所以被舍弃掉,往往只是因为这个学科背景下它不重要,或者根本就是使用这种学科的手段没有办法对它进行研究所致。所谓实事求是,就是要敢于面对真正的问题,对于中国农村现代化这样一个具有战略性、全局性的复杂问题来说,更应当抱有这样的一种态度。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农村问题,中国现代化问题,在多年各个学科研究成果积累的基础上,需要有一种综合性的表达,从实践的需要来看,要有一种综合性的、整体的解决方案。正因为如此,我赞赏立胜的这种“问题”意识,并鼓励他在这方面做出积极的尝试。另一方面,立胜采用这样一种综合性的视角切入中国农村现代化研究,也有他的独特优势。他在山东大学跟随著名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樊瑞平教授读硕士研究生,20世纪90年代初到山东省委党校工作,发表了许多相关成果,获得过一些高层次的奖励,年纪轻轻就成为全国毛泽东哲学和经济思想研究界有影响的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先做市委副秘书长,后来当县长,又当市委书记,由学者而从事行政,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生活际遇,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心路历程。学者的思维通常是“应然”,行政的思维通常是“实然”,二者之间有着不小的差

距。但是如果长期身处其中没有变化的话,就会把自己的这种思维当作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失去反思的能力,正如黑格尔所言,“熟知并非真知,恰恰是因为它是熟知的”。如果角色有一个大的变化,能够以学者和官员的视角同时审视和分析现实问题,能够真正地将理论放置到实践中去加以检验,就会发现理论的破绽,也会真正发现实践距离理想目标的巨大差距。这样,理论和实践都同时找到了发展的方向。从这个方面说,立胜是幸运的。他的幸运表现为他有了这样一种难得的人生经验,使他能够以经过严格训练的科学态度和缜密方法全面地进行“参与式观察”,也表现在他在从事行政工作以后还能够一直保持学者的研究精神和研究习惯,十几年孜孜以求,没有被琐碎的行政事务所湮没,而一直在试图发现中国农村基层的真正逻辑和真正问题,并且能够以规范的理论范式将其表述出来。这是他能够从问题意识出发展开研究的优势所在。

从“问题意识”角度对中国农村问题进行研究有着非常大的难度。一方面是要有这种实践的机缘,更重要的是要有多学科的知识 and 理论储备。在立胜的博士论文中,综合使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共党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从而形成了围绕“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核心概念的综合分析体系。能够熟练地使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实现综合研究,可以体现出立胜扎实的理论功底,也可以检验出他平常的刻苦用功的程度。他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准备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在 CSSCI 类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成果数量应当是在东北师大同期博士生中最多的,同时还出版了专著《作为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的邓小平理论》。有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马克思主义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等重要的学术文摘转载,体现出论文的先进性、深刻性、前瞻性,也说明立胜的学术成果已经被国内学术界所高度重视,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由于立胜在学术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以及在博士学位论文准备方面的出色表现,他获得东北师范大学 2007 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基金,全校文科仅有三人获此资助,并且被学校确定为以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为目标的重点扶持人选。作为他的导师,内心的喜悦是难以言表的。

在立胜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会成员一致认为他的论文是“一篇难得的优秀博士论文”。认为他的论文在纵向的历史分析和横向的现实分

析的结合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以“社会基础”概念为主线,重新梳理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变迁的脉络,对于国家战略实现与社会基础的改造之间的关系的分析提供了对改革前后国家政策导向与中国社会变迁轨迹进行更深一步认识和研究的新视角,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进步。尤其是在他的论文中,对于毛泽东“组织起来”思想的深入阐述以及在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时如何体现这一思想精髓的论述,令人耳目一新;对于农村税费改革背景下乡村政治生态的影响的研究极其细致入微,理论阐述与现实分析的结合、对农村基层本质性问题的认识和把握、对税费改革前后农村社会结构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的理解和分析都达到了很高的研究水平;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空定位问题的研究发前人所未言,他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间和空间定位问题上的不同认知,不是要求速度快慢、范围大小的差异,事实上反映的是在理论预设、价值取向、发展战略方面的重大差别的观点;认为时间定位方面的激进取向会导致政策体系的制定和供给不会考虑和照顾农村地区的独特性而倾向于以城市生产生活内容为标准,会以工业化的甚至是后工业化的观念框架和概念系统去定义和解释农村社会的现象;认为空间定位包括统一的中央政策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非常巨大,同时地域文化差异也十分明显的不同区域得到全面的贯彻实施,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建设单位在空间上应当定位于具体的“村庄”还是县域视野中的“农村”的观点等等,都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中共党史的角度来看,立胜所提出的“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理论,可以理解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对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背景下,党的领导的实现方式问题。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组织起来”为动员手段翻转了中国基层社会,获得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极大支持,取得了革命的成功,在建国后又以唤起农民的阶级意识和培养农民的国家观念等手段使农民形成了一致行动的能力,成为实行以重工业为导向的高速工业化战略的社会基础,那么,在现阶段,尤其是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党的领导应当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和方式得以实现和强化?党在农村基层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控制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实现方式?就成为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立胜认为,党应当有效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使之成为能够被正式体制所内化、吸收、控制的

正面积极因素,实现农民真正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实现在市场化条件下尽量减轻和避免资本力量对小农的损害,避免国家对小农的过度提取,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立胜在这方面的理论探讨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具有原创性的贡献。

党的领导的有效实现方式问题,对于立胜而言,不仅是博士论文中所探讨的主要问题,而且也是他日常行政工作的中心任务。或许正因为如此,他的体验才如此直接而深切,他的分析和阐述才能如此切中要害。立胜的行政职务是中共山东青州市委书记,他在东北师大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也正是其在青州施政的三年,对于“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的思考和研究同时贯穿在他的论文写作与实践工作当中。正是在实践中发现了问题,遍搜文献却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与答案,因此就有了探索一条新的道路的愿望和动力,这种动力既体现在理论探讨中,也体现在青州的发展变化中。这几年,我先后几次到过青州,每一次去都会看到令人惊叹的巨大变化。“奋战两年,重进全国百强”的目标仅用一年时间就实现了,青州的经验被媒体称之为“科学发展的青州模式”,每年来青州参观学习的考察团都有200多批次。在和立胜讨论青州发展变化的本质原因时,他认为正是在青州这个县域范围内自觉进行了“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再造”的工作,正是因为把握了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农村形势的新变化,使农民的基本连接关系能够和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相契合,农民才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实现了高度的一致行动能力。在他看来,青州的发展变化,不仅仅是经济结构的优化、产业结构的升级、城市建设和管理方式的转型,也不仅仅是干部作风的转变、群众思想观念的解放,从本质上说,在于青州的社会关系体系、社会关系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市民还是那些市民,农民还是那些农民,但是当他们之间的连接关系和交往方式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们的创造性就会以前无法想象的方式极大地焕发出来。党组织的整合能力越强、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和社会控制能力越强,这种变化和创造性也就越快、越强。因此,青州的变化是社会结构方面的,具有社会变迁的含义。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弄清青州发展变化的实质性原因,不理解这一点,也就无从把握“科学发展的青州模式”的本质内涵。

我一贯认为,评价博士生学习成功与否的标志是学位论文的质量和水平。在一定意义上说,一个立意新颖、具有可持续研究的方向是博士生安身立命的

根本。博士生学习是一个艰苦的创造性劳动的过程,是融读书学习、研究思考、创新学术为一体的包括诸多环节的过程,也是一个张扬学术自主性、彰显学术研究性的过程。博士生导师的主要工作不在于能为学生开出几门课,而在于怎样去引导学生学习。或者说,导师的主要工作不在于“教”而在于“导”,即在于怎样引导学生熟悉本学科或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方法,怎样引导学生进行创造性学习,提高其研究能力,怎样引导学生选择一个既有研究价值和实际意义、又有创新性的学位论文题目,并确立论文的核心概念,建立新的分析框架,进而开展深入、系统地研究。

立胜的博士论文作为以应用研究为主、兼具学术研究特色的成果,提供了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型范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可以把立胜的这本书作为青州以至整个中国农村发展变化的一种理论概括,或者说,可以把青州的发展变化作为本书的个案来解读。

祝愿立胜在工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两个方面都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是为序。

田克勤

2009年1月20日于长春净月东师家园

目 录

序	(1)
导 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基本概念	(4)
(一)中国农村与中国农民	(4)
(二)现代化	(9)
(三)“社会基础”	(15)
三、研究内容及叙事框架	(20)
(一)研究内容	(20)
(二)叙事框架	(22)
四、创新观点和进一步研究展望	(25)
第一章 基本理论及研究基础	(27)
一、基本理论	(27)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论述	(27)
(二)毛泽东“组织起来”思想	(31)
(三)关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社会学理论	(40)
(四)社会基础分析框架的理论品格	(48)
二、研究基础	(56)
(一)理论原型	(56)
(二)中国农村现代化研究的核心命题	(62)
第二章 市场化战略的实施:对中国农村现代化既有社会基础 的双重消解	(71)

一、市场伦理与传统伦理——乡土社会的消逝	(71)
(一) 乡土社会的内在结构	(72)
(二) 市场化的兴起对乡土社会的冲击	(79)
二、市场逻辑与革命逻辑——总体性社会的瓦解	(81)
(一) 总体性社会形成的历史逻辑	(82)
(二) 市场逻辑对总体性社会的消解	(86)
三、市场化背景下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的再造——真正的问题	(90)
第三章 构建农村基层基本连接模式: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	
再造的政治制度供给	(92)
一、纵横交织:传统中国农村政治构架的特点	(92)
(一) 保甲制:传统乡村社会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	(92)
(二) 士绅:联结传统乡村社会“双轨政治”的中介	(96)
(三) 差序格局:传统乡村社会基础的内核	(100)
二、革命的实践——以阶级的名义	(104)
(一) 革命政权建设:塑造工农阶级主导的政治基础	(105)
(二) 嵌入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基层政权建设	(107)
(三) 扎根并翻转基层:“革命”中的社会基础改造	(109)
三、人民公社——国家意志的压倒性体现	(112)
(一) 人民公社:国家目标与社会基础的对接	(113)
(二) 集体主义:赶超战略下重构农村社会基础的实践及其 运作机制	(117)
四、村民自治——构建中的农村基层政治秩序	(123)
(一) “遭遇”自治的农村社会	(123)
(二) “一肩挑”:一条探索中的解决之道	(126)
(三) 村民自治框架下的重构农村基层政治秩序	(128)
第四章 发展农村合作组织: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再造的重要	
路径	(132)
一、农村公共产品生产的困境——农村合作组织的必然性	(132)
二、农民合作——农民主观理性的“非理性”选择	(140)
三、农民合作困境的化解之道	(143)

(一)农民合作中行动主体的类型	(143)
(二)村庄之外的力量:农民合作的催化因子	(145)
(三)组织资源:走出“囚徒困境”的基础	(149)
第五章 重构农村金融: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再造的重要经济 纽带	(154)
一、农村金融与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	(154)
二、传统中国农村金融的典型表现——高利贷	(156)
三、改革以来农村金融政策实践轨迹	(161)
四、当前农村金融资金供给状况	(167)
五、再造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实现农民与资本的良性对接	(172)
第六章 重构乡村秩序: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再造的社会治理 实践	(175)
一、农村社会纠纷的解决方式	(175)
二、私力救济机制在村庄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分析	(177)
三、社会型救济之调解的历史回顾与现实困境	(180)
四、公力救济及其在乡村中的实践	(186)
五、规范性司法制度在乡村社会秩序构建中的局限性	(190)
六、走向多元化的乡村秩序建构之路	(192)
第七章 重建农民的观念世界: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再造的 文化视域	(195)
一、作为一般概念的“农民观念世界”	(195)
二、农民观念世界的政治性表达	(196)
(一)农民的阶级观念	(196)
(二)农民的国家观念	(198)
(三)农民的“农民”观念	(208)
三、农民观念世界的日常生活表达	(212)
第八章 农村税费改革: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再造的行政 策略	(217)
一、“压力型体制”与“营利性经纪”:税费改革前的乡村关系与 乡村治理	(217)

二、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社会影响的一般性描述	(224)
(一)农民负担减轻的实证数据	(224)
(二)地方财政下降的实证数据	(225)
三、农村税费改革对于农村社会诸关系的影响	(227)
(一)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对乡村关系的影响	(227)
(二)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对于农民合作水平和一致行动 能力的影响——以一事一议为例	(232)
(三)在严格的政策压力下,各种变通行为不断产生	(234)
(四)“压力型体制”仍然是政绩考核系统的基本属性	(235)
(五)农业产业化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增大	(236)
(六)税费改革政策在政策连续性方面的缺憾	(237)
(七)对加强基层国家政权建设产生不利影响	(239)
四、简要的政策建议	(241)
第九章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再造 的国家战略	(247)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在哪里	(247)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空定位问题	(252)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间维度分析	(252)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空间维度分析	(257)
(三)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空定位的综合分析	(259)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在于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 再造	(262)
结语	(270)
后记	(272)

导 论

任何一项社会科学研究都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同时也必然有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中国农村现代化研究也不例外。导论在回答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对本书所使用的几个基本概念进行详细梳理,对研究内容进行概括性说明,对本书的叙事框架进行简单陈述,并表明笔者致力于达到的理论创新之努力。

一、问题的提出

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各级政府机构、官员的共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以及实践,又为中国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政策背景和理论支持。应当说,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推行,农村现代化的方向和目标业已确定,关键问题在于能够有一整套具有较强操作性的中层理论以更好地指导实践的开展。这种中层理论体系必然是不但能够分析当前农村诸问题的本质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性建议,而且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整个历程;不但能够使用以特定概念为核心的分析框架总括式地理解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同时可以以此为工具有效地分析中国农村社会诸领域的具体现象与问题。实践需要这样一种理论体系,但是就目前的状况而言,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寻求这样一种答案,正是本书努力的方向。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可以描述为一个超大型农民国家在资源禀赋极差,外界地缘环境紧张的情况下,实现赶超型的现代化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当前中国“三农”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最本质最重要的社会矛盾在当代的具体体现,或者说,是一个超大型农民国家在长达上百年的向现代化转型

的过程中最关键的、带有连续性特点的矛盾问题在当代的具体体现,是一个老问题而非新问题。中国“三农”问题的实质体现于两个方面:在特定资源条件下,一是分散的小农与市场对接的成本太高,表现为小农与资本之间的关系紧张;二是分散的小农与政府之间的交易成本太高,表现为农民与国家的关系紧张。这两种紧张关系自清朝末年、民国以降一直是困扰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也是当前“三农”问题成为严重战略问题的历史根源所在。极度分散的小农形态与近代以来中国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道路之间有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紧张,这种紧张状态事实上促成了近代以来中国基本的社会结构形态的形成,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政权前后所进行的社会改造和革命的努力即是解决这种紧张状态的实践过程。而实践方式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基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建构以及现代化道路的现实走向。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书将农民间的连接关系、农民个体与国家的连接关系以及由农民个体经由特定的形式组成的农民群体与国家的连接关系模式作为决定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方向、模式和形态的根本性因素,并以“社会基础”概念来概括这一组关系模式。相应地,我们也可以把调整和改变这种关系模式的努力称之为“社会基础再造”。

可以把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之再造的过程简略地分为这样带有连续性的五个阶段:从民国建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为第二阶段,从1956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为第三阶段,1978年到目前为止为第四阶段,而此后一直到21世纪中叶是本书所构想的第五个阶段。从民国以来的四个阶段及其过程中的三次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的翻转,使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目标、模式和发展道路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949年前的革命是一个翻转社会基层、再造中国社会基础的过程,以此实现与革命理想的对接,本身也是革命理想实现的途径与过程。这一过程中,“阶级”概念和阶级观念以及阶级建构的实践从彻底的意义上改变了农民的连接关系,使之在一种全新的关系模式中获得了一致行动的意识 and 能力,在共产党的组织动员下成为实现革命理想最重要的力量。1950年以后,为了实现赶超型的工业化,以国家资本主义和人民公社等方式再一次重构了中国农村的社会基础。历史地看,这两次都是较为彻底的再造,就其目标实现而言也是成功的。1978年以后的改革,提出

了一种新的社会理想取向,但由于渐进式的或者目标开放式的改革模式,相对于前两次而言,社会基础的重组和再造却是模糊不清的。一方面,前一阶段的影响极大地延续下来,农民的连接关系并未实现彻底转型,国家权力的运作方式也迟迟没有多大改变;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实际上已经彻底改变了,这就导致市场化的目标与既定的社会基础之间不兼容,小农与市场化目标无法实现对接。前述三个阶段都是中国农村现代化过程的连续性阶段,不过每一阶段都有其特定的具体目标与导向,这说明,一种社会理想目标的实现,必须要有相应的社会基础——农民连接关系相对接。而在实践当中,迄今为止的社会基础建构并不能与所提出的发展目标相契合,因此必须进行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在发展模式和路径上要实现与社会基础的契合,另一方面,要再造社会基础以实现与总体目标之间的对接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农村现代化研究十分关注,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这些研究大都受到“学科意识”的支配,学者们局限于学科的视域和方法,因而得出的往往是局限于某一学科无法准确全面反映中国农村现代化规律的结论。经济学从“理性人”假设出发关注农村发展,甚至把农村现代化过程还原为农业发展的效率问题,进而把农业的效率问题归结为农村农业的体制机制问题,从而认为,通过体制变革提高了效率也就找到了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道路。而在现实中,农民的行为事实上表现为农户的行为,从而很难用“理性人”假设加以概括和说明,当然这种理论也就更加无法有效解释农村诸种复杂问题的成因。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都从各个方面对农村现代化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但是由于无法摆脱学科意识本身的褊狭而不能在彻底和综合的意义上取得进展。中国农村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需要的是“问题意识”的自觉,也就是说,当前需要各个学科以“问题意识”为基点,加强协作配合,综合使用各种理论方法,才能为中国农村现代化实质性的推进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本书认为,如果不能从综合性和实践性的“问题意识”出发,不能从最为基本的社会基础再造角度对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做出分析,也很难以此对政治架构和权力运作方式的变迁做出真正深刻的理解和说明。

经过百余年的探索与奋斗,我们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中国农村现代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正如黄仁宇所言:“将一个农业国蜕变为一个工商国家不